

중국 초기 불교의 수용과 발전

-『모자이혹론』을 중심으로

구려사(邱麗莎)

(중국인민대학교 철학과 박사과정)

국문 초록

양한(兩漢)시대에 중국에 전해진 불교는 안세고(安世高)로 대표되는 소승선법(小乘禪法)과 지루가참(支婁迦讖)으로 대표되는 대승반야학(大乘般若學)이 주류를 이루었다. 이 당시 중국에 전해진 불교는 당대에 유행했던 황로방술(黃老方術)과의 유사성이 강하기에, 불교는 이것들을 격의하며 중국에 퍼져나갔다. 이러한 중국의 불교는 한나라에 이르러 정치와 사회의 혼란기를 맞이하였다. 이때 본래 중국 사상의 주류였던 유가(儒家)를 토대로 만들어진 도덕관념이 흔들리기 시작하였다. 이와 함께 도가(道家), 법가(法家) 등 과거에 있었던 사상이 다시 흥기하였고, 불교 또한 새로운 전환기를 맞이하였다. 불교는 처음에 전래되었을 때부터 황로학과 도가의 유사성을 강조했다는 주목할 만한 점이 있다. 이러한 특성은 격의와 토론을 통해 심화되어 삼교의 교섭이라는 형태로 나타나게 되었다.

중국에서 삼교교섭의 첫 저작으로서 『모자이혹론』이 나타나게 된다. 『모자』에 대한 학계의 주된 연구는 저술의 진위의 판단에 초점을 맞추고 있었다. 본 연구는 『모자』에 대한 진위 여부가 아닌 저술이 출연한 시대의 배경에 집중하여, 당시 중국에서 불교의 변화를 고찰하는 것에 목적을 두고 있다. 불교에 귀의한 중국의 지식인 모자(牟子)는 도가의 개념을 가지고 불교를 해석하고, 유가서적과 도가를 가지고 유가를 반박하였고, 또한 신선방술을 비판하며 불교의 우수성을 피력하였다.

이러한 사상의 피력은 후일 불교가 중국 사상계의 주류가 될 수 있게 만드는 밑거름으로 작용했다. 『모자』에 묘사된 전환기 불교의 이미지는 시대를 표상하는 불교의 복합적인 얼굴이었다.

주제어 : 모자이혹론, 불교, 도교, 유가, 신선방술

摘要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 由于与黄老方术的相似性, 起初传入汉地的佛教主要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法和以支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 汉末三国, 群雄割据, 社会动荡. 在意识形态方面, 儒家名教的统治地位受到重创, 道家法家等思想复兴. 思潮涌动的乱世, 佛教也迎来新一轮的转型—强调与道家学说的相通性, 『牟子理惑论』所展现的正是此时的佛教.

『牟子理惑论』作为中国历史上首部论衡三教的著作, 学术界对其真伪的考辨用力颇深. 本文着力于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下, 探讨佛教的转型问题. 牟子作文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 利用其强大的知识背景为佛教辩护. 他以道释佛, 驳斥神仙方术, 用儒道反儒论, 使佛教摆脱迷信的嫌疑, 与当时正在复兴的道家思想建立了明确的联系, 为以后佛教跻身中国主流思想之列铺平了道路. 通过『牟子』的一番描述, 正值转型期的佛教形象跃然脑海, 它是时代的画笔所描绘的一幅复合性的佛教形象.

关键词 : 牟子理惑论, 佛教, 道家, 儒家, 神仙方术

I. 前言

佛教传入初期与中国文化的交涉主要是“调适与比附”。¹⁾

早期的佛教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不停地调适和比附，以寻求发展方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曾发生过巨大转型—由依附黄老方术转而依附道家学说。『牟子理惑论』²⁾所展现的便是此次转型期的佛教。

『牟子』相传为东汉末年牟子博（一说牟融）所撰，除序和跋，正文共三十七章，以前所未有的定式问答，记录了“牟子”与问难者围绕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而展开的辩论。由文中的牟子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熟读经传诸子，涉猎兵法，神仙不死之书等领域。但因世道暴动纷乱，便改修佛教，兼研道家。³⁾世俗之人认为他这种行为是“背五经而向异道”，于是牟子效仿『道德经』三十七篇作『牟子』三十七章，以明其志。关于『牟子』的真伪，学界议论纷纭，仍无定论，但普遍的看法认为『牟子』当成于三国时期孙吴初期。⁴⁾

『牟子』一书不仅“比物连类，繁称博引，意存讽谕，词协宫商”⁵⁾具有一定的文学魅力，更是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受容和发展的珍贵资料，它不仅是中国首部论衡三教的著作，也是中国佛教史上首位本土的有识之士为佛教挺身而出的辩护书。⁶⁾日后三教论衡所涉及的主题几乎不出此书的讨论范围。这意味着佛教中国化取得的首次突破性转型，不再只是一味地按照异域僧人或其所翻译的经典被动地去了解佛教，而是积极主动地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尝试对佛教的阐释，是中国佛教迈向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汉末三国时期，由于佛经翻译质和量上都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牟子“以道解佛”，“借儒道反儒论”⁷⁾，驳斥神仙方术，逐一化解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为以后的佛玄合流，乃至发展成为中国主流思想中的一支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在对『牟子』进行分析和解读的

1) 方立天先生将佛教与中国文化交涉大体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调适与比附。具体指佛教传入之初依附道家、道学，到了魏晋则主要依附于玄学；第二，冲突与抗衡。东晋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日益增多，流传更趋广泛，与中国文化的矛盾日趋明显。此矛盾集中表现在佛教与儒家、道教的关系上，冲突领域主要是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和儒释道三教地位的高下问题。第三，融汇与创新。隋唐以来，佛教吸收中国本土思想而创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阶段。参照 方立天 2006, 367.

2) 以下简称『牟子』。

3) [梁]僧祐『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1b21-25).

4) 任继愈 2019, 119.

5) 余嘉锡 1936, 1.

6) 汤用彤 2015, 54. 不仅因为其为现存支那撰述之最早者，而可重视也。

7) 张凯 2014, 39.

基础上,联系当时社会思潮的变化,探讨『车子』试图阐明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而分析其背后所蕴藏的逻辑思维和真实意图,以展现佛教在中国早期受容和发展的动态过程.

II. 思潮的转换

『车子』的作于“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之时,⁸⁾此时正值东汉后期,黄巾起义爆发不久,⁹⁾佛教传入已近两百年.¹⁰⁾中国西汉初期遵奉“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取奢尚俭”,提倡“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汉武帝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此时的“儒术”,已非孔子之儒学,而是董仲舒所提出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融合各家思想系统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黄老之学”¹¹⁾虽退出政治舞台,但它与社会上早已流行的神仙家思想,¹²⁾阴阳五行说以及各种方术结合,演变为黄老方术,广泛流行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成为道教的前身.

西汉末至东汉,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党争激烈,选举制度腐败,外加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封建统治面临严重危机,残酷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也动摇着原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¹³⁾许多经学大师开始注意研究儒家以外的各家学说.¹⁴⁾尤其是黄巾起义后,军阀混战,汉室倾覆,三国鼎立,儒家名教更是受到严重打击,名家,法家和道家思想复兴.曹操(155-220)求贤若渴,但着此“贤”并非指儒家之“贤”,而是所谓的“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¹⁵⁾的人

8) 『弘明集』卷1「车子理论」(T. 52, 1b3-4).

9) 汉灵帝刘宏于189年驾崩,黄巾起义爆发于184年.

10) 根据三国时魏国鱼豢『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引注)中,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廋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

11) 因其本身包含修身养生的理论,加之又冠以黄帝之名.

12) 黄帝亦为神仙家崇拜的神仙,神仙家追求长生不老,甚至变成神仙.

13) 儒家思想的政治地位的动摇可归结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已经失灵.另外,『汉书·儒林传』中说儒家“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汉书·艺文志』也说儒家“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可见也与其自身的发展已达极限有关.

14) 汉末经学大师马融(79-166)综合家学说,编注群经,打破了古今文学的界限.他兼注“三礼”(儒家的『仪礼』,『周礼』,『礼记』),还崇奉老庄,为『老子』,『庄子』作注.郑玄(127-200)博通百家,有很多注经.可见,“当时思想界对所谓儒者已不甚重视,而更推重兼通百家的通人.”(参照任继愈 2019, 115).

15)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五史』2, 1992, 1073).

才。仲长统¹⁶⁾ (188-220) 著『昌言』, 主张“人事为本, 天道为末”, 反对儒家唯心主义“天命”说。他深受道家思想影响, 认为“名不常存, 人生易灭”, 著论引老庄言曰:“安神闺房, 思老氏之玄虚, 呼吸精和, 求至人之仿佛”, 甚至说:“寄愁天上, 埋忧地下. 判散五经, 灭弃风雅, 百家杂碎, 请用从火。”¹⁷⁾“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作『中论』, 详细论证“才智”高于“志行”, “权谋”高于“蹈善”的道理。他还对“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 “怀让心而不知佞伪”, “守节而不知权”等等的历史人物则加以讥讽。¹⁸⁾

这些都表明, 汉魏之际的思想界已逐渐摆脱儒家思想的禁锢, 文化思想变得活跃, 其中道家和名家思想开始受到推崇。以此为契机, 佛教也迎来了传入汉地后的第一次转型。与上述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 牟子早年熟读经书, 但“方世扰攘, 非显己之秋”, 他也不满于当时儒家的纲常名教, 转而拜服佛教, 并兼习老子。

III. 佛教的转型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 就有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之分。传入汉地佛教的种类与当时传法僧所学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早期的传法僧以安世高和支娄加讖为代表, 他们分别传入小乘禅法和大乘佛教般若学。这两类佛教学说之所以能够顺利传入, 主要因为它们与黄老方术的相通性: 在思想上, 佛教讲“清静无为, 省欲去奢”, 与道家思想如出一辙; 在形式上, 佛教也作斋戒祭祀, 说神不灭, 与神仙方术中的祠堂祭祀, 不死成仙相似¹⁹⁾, 这些都是西汉末流行的黄老方术所具有的特征。

1. 佛教的方术时代

中国佛教史上对汉地佛教早期的传播, 有说是依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得以传播。²⁰⁾ 也有说因与广泛流行于当时社会上的“黄老方术”或“黄老道术”等²¹⁾类似而得以流传。若

16) 在献帝时官至尚书郎, 后参曹操军事。

17) [刘宋]范曄「后汉书·仲长统传」(『二十五史』2, 1992, 948)。

18) 参照 任继愈 2019, 116。

19) 汤用彤 2015, 54. 其教旨清静无为, 省欲去奢, 已与汉代黄老之学同气, 而浮屠作斋戒祭祀, 方士有祠祀之方; 佛言精灵不灭, 道求神仙却死, 相得益彰. 转相资益。

20) 汤用彤 2015, 54。

21) 任继愈 2019, 127。

依『牟子』说佛教依附“黄老方术”或者“黄老道术”而得到传播的说法似乎更为准确。

1) 佛教与黄老方术

黄老方术是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的结合体，曾广泛流行于东汉末三国初，具有宗教迷信性质。如上节所述，汉初遵奉的黄老之学，借用丁原明在『黄老学论纲』中的定义，是一种借黄帝之名而推行老子道家思想的一派，以道为核心，而兼取百家之学的道家思潮。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之学便退出政治舞台。但由于其所包含修身养生的理论，加之又冠以黄帝之名，它与社会上早已流行的神仙家思想，阴阳五行说以及各种方术结合，而演变为黄老方术流行于西汉中期到东汉末。因此，黄老方术既以道家的思想为背景，又追求神仙家的长生不老之术。佛教两汉之际传入之时，恰逢黄老方术活跃之际，它既讲“清静无为”，又作斋戒祭祀，说神不灭，这些都是黄老方术所兼具的特点。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将佛教与黄老方术等同视之。譬如，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²²⁾汉桓帝在宫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像并列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等。²³⁾『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²⁴⁾

但毕竟能够读到佛经，且了解“清静无为”的人是少数。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应该是借助其与神异的方术相似性。这从外来僧侣宣传佛教的重要途径就可推知。例如，安世高就会观五行之象，望风角，懂得医术，观色知病，闻声知心。三国时到吴地的康僧会“天文图纬，多所贯涉”。昙无讖罗“风云星宿，图讖运变，莫不该综”。²⁵⁾还有东晋十六国时的佛图澄，鸠摩罗什，昙无讖等也借助阴阳星算，神咒方术来影响群众。安世高所译的『安般守意经』中所介绍的数息观是通过控制呼吸（入息与出息）来澄心净虑的一种禅修方法，这与神仙方术中的呼吸吐纳法比较接近。在考古界还发现了汉末三国时期佛仙并列的“摇钱树佛像”。²⁶⁾基于此，中国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先生甚至将佛教传入的第一个阶段，即东汉三国时期划分为佛教的方术化阶段。

22) [刘宋]范晔「后汉书·楚王英列传」(『二十五史』2, 1987, 929).

23) [刘宋]范晔「后汉书·桓帝纪」(『二十五史』2, 1987, 788).

24) [刘宋]范晔「后汉书·襄楷传」(『二十五史』2, 1987, 899).

25) 见『高僧传』卷一.

26) 张风雷 2022, 203-205.

2) 方术时代的终结

佛教既然依附神仙方术得以传播,按理来说,它应该与神仙方术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但在『牟子』中,却表现出对神仙方术表现极度的排斥.例如,牟子反对神仙方术所推崇的辟谷,饮酒啖肉,提倡佛教“酒肉为上戒,而反食谷”的主张.他否认问者所说的,老子和儒家七经有禁五谷的说法,认为“物类各有性”,人们不应效仿“六禽闭气不息,秋冬不食”的做法.牟子还以自己的经验证明“辟谷之法,数千百术,行之无效,为之无征”,进而批判这种神仙方术的修行不仅未能延年益寿,反而加速会加速死亡.²⁷⁾牟子甚至直呼神仙方术们说的“道家云,尧,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仙”是“妖妄之言,非圣人所语也”.²⁸⁾他早年就认为,神仙不死十分荒诞,不足为信.²⁹⁾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他还拜师学习辟谷之术,更是验证了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³⁰⁾笔者认为,牟子对神仙方术的排斥,应该并非只是基于个人的喜好,其背后当有更深层的原因.

武帝早年苦求长生不老,不死成仙.他对方士的礼遇,使得方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迅速提高,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也因此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但到了武帝晚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尤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³¹⁾可见,神仙方术由于其成仙法术得不到验证,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封神禅书』中谈到方仙道这一方士群体,称之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³²⁾正史对神仙方术的负面评价,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神仙方术的看法.例如,在牟子身为儒者时,就曾以五经问难神仙方术.³³⁾

牟子在论及佛教与神仙方术时还说“佛道非不正,众私掩其公”,³⁴⁾暗指佛道受旁门左道(神仙方术)的牵连和影响而常被世人误解,因此他才“分而别之”.不过,有趣的是,问难者也当即承认了神仙方术确实不足为信.³⁵⁾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神仙方术的态度十分消极和排斥.佛教要寻求自身发展,首先必须要澄清与神仙方术的区别,与其划清界限.进而,再寻求新的依附对象,这应该是牟子驳斥神仙方术的深层原因.

27)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6a12-21).

28)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6c29-7a2).

29)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1b2-3).

30)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6a22-26).

31) [西汉]司马迁「史记·孝武本」(『二十五史』1, 1987, 53).

32) [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二十五史』1, 1987, 174).

33)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1b4-6).

34)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6b23-24).

35) 『弘明集』卷1「牟子理惑论」(T. 52, 6b27-28).

2. 佛教道家时代的开启

前文已考察过，早期佛教能够依附黄老方术得以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其中所蕴含的小乘禅法和大乘般若学分别类似于黄老方术中的神仙方术与道家思想成分具有相似性的缘故。佛教与神仙方术上节已论及，这里再说道家。佛教能够选择道家新依附对象的不二人选，首先是两者在思想上的相通性。另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早期佛经翻译大多借助道家思想和用语的缘故。

1) 佛道的相通性

无论是黄老之学还是黄老方术，或是之后的魏晋玄学，它们都与道家学说有关。无论说佛教依附于黄老之学，或者黄老方术，乃至之后的魏晋玄学，其本质都离不开佛教与道家的相通性。

早期的佛经常常借鉴或者借用与之思想近似的中国典籍的词汇来翻译，这被中国佛教史学家称为“格义”。那么具体找哪类中国典籍的思想去表达佛教理念，哪类词汇才能相对准确地表达佛教用语呢？与佛教一样追求“出世”的道家思想和道家典籍便成了不二人选。因此，很多佛教典籍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或者用语来进行翻译，以帮助中国人理解。例如传世藏经本《安般守意经》中说：“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为名，是清净无为也。”等说法；支谶将“真如”译为“本无”；“涅槃”常被译为“无为”；“无我”被译为“非身”；禅定译为“守一”等，这些都源自道家思想和《道德经》，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黄老方术中的“道家”，但本质还是老子的道家和《道德经》。

车子通篇虽然没有提到过“黄老学”或“黄老方术”，但车子在说明佛陀一些超能力时，也不可避免地运用了黄老方术的说法加以描述。例如，车子特别结合了秦汉流行的黄老神仙学说，使得佛与中国的神仙“真人”非常相似³⁶⁾。他说佛陀“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³⁷⁾《车子》通篇涉及佛教的部分，几乎都是以道释佛，以道家思想来驳斥神仙方术，处理儒家的关系。另外，车子驳斥神仙方术的目的，似乎要明确佛教的主体性，即强调佛教与道家的一致性，而非黄老方术名下的“道家”思想。这应该与当时社会条件下，道家地位逐渐上升有一定的关系。

36) http://read.goodweb.net.cn/news/news_view.asp?newsid=95839(检索日期：2023.02.28.)

37)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2a7-13).

2) 车子以道释佛

『车子』全文对佛教的直接描述只有介绍佛陀的成长,出家,修道,成佛等过程出自佛教经典.³⁸⁾ 关于佛经的教理教义,制度规定等方面基本都是通过与儒家,道家的比较来凸显的,直接关涉佛教义理方面较少,这与当时佛经的翻译情况以及人们对佛经的理解尚不成熟有关.车子通篇几乎都是将佛教与道家等同视之,进而以道家学说来论证佛教的观点,最典型的,就是,车子对(佛)道的解释几乎都是援引于道家:

“道之言导也, 导人致于无为. 牵之无前, 引之无后, 举之无上, 抑之无下, 视之无形, 听之无声. 四表为其大, 其外, 毫厘为细, 间矣其内, 故为之道.”³⁹⁾

可见,在以车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佛教信徒看来,佛道是为让人达到“无为”的方法,这符合当时佛教翻译家借用道家的“无为”一词来对译“涅槃”的情况.这些描述虽然并不准确,或者与佛教原义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单凭“佛之言觉也”⁴⁰⁾这一句表明,车子对佛陀的概念把握还是比较准确.⁴¹⁾因此,尽管车子认为佛道相通,但两者终究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解决与冲突最激烈的儒家礼制上的矛盾时,车子也常援引『老子』和传统的道家观点来对抗儒论,为佛教辩护.例如,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沙门却剃发修行;儒家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佛教却主张“不娶妻生子”;儒家有“貌服之制”,“威仪盘旋之容”,但佛教却“披赤布”,“无跪拜礼”;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黄帝养性,以五肴为上”,而佛教提倡“一日一食”,“酒肉为上戒,而反食谷”等等.车子引用『老子』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称妻子,财货,名誉和子嗣皆为身外之物,清躬无为才是至妙之道才上等人追求的东西.沙门为修道而抛家弃子,放弃世俗享乐,是高尚的行为;他还引『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主张,不追求形式之德才是“上德”,举“三皇之时,食肉衣皮,巢居穴处,以崇质朴”说“沙门之行,有似之矣”,以此来论证沙门披赤布,无貌服制度和跪拜之礼是追求老子所说的“上德”,符合圣人崇尚质朴的观念.⁴²⁾对于饮食方面的问难,车子引『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圣人为腹不为目”⁴³⁾论证沙门省欲去奢,一日一餐是摒弃物欲的诱惑,重视内心的满足的表现.

总的来说,车子几乎通篇都在“以道解佛”,“以道护佛”,甚至连『车子』全文都是效仿老

38) 车子对佛陀的描述很多取自于吴支谦译的『太子瑞应本起经』(参照 任继愈 2019, 201).

39)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2a14-18).

40)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2a9).

41) 任继愈 2019, 212.

42)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3a28-b3).

43)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4c6-9).

子的『道德经』作三十七章. 这些都说明, 以『车子』为代表的当时的佛教意在摆脱与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的关系, 转而明确强调与道家思想的亲缘性. 这为魏晋时期佛教与以老庄思想为主干的主流思想玄学, 即佛玄的合流埋下伏笔.

IV. 佛教对儒家的迎拒

异域文化想要在中国土地扎根, 除了在外在形式与内在思想方面, 努力靠近与自己有相近理念的本土文化之外, 还需疏通与己相异势力的阻力. 由于根本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佛教冲突最激烈的莫过于儒家, 与儒家的激烈论辩可以说是『车子』最精彩的部分.

1. 对儒家迎合

佛教与儒家在思想与形式上有明显的差异: 佛教讲“避世”, 而儒家要求人“入世”. 这种差异虽然使两者在对待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 但另一方面, 也造就了两者具有互补的可能性. 佛教传入初期对儒家采取竭力迎合的态度, 这点从佛经翻译中就可以看出.

1) 佛教对儒家吸收

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学, 自汉武帝以后便一直在中国思想界占主流地位, 俨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规范, 影响这人们思维模式. 为适应中国土壤, 佛教积极吸收儒家学说, 取长补短.

儒家致力于人伦道德的阐发, 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人间秩序规范, 成为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 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主张人人平等, 每个人的境遇都是有所造业而决定的. 为了适应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 东汉安世高译『尸迦罗越六方礼经』, 西晋支法度译『善生子经』, 东晋僧伽提婆译『善生经』等佛经中, 对社会的人际关系, 都通过选, 删, 节, 增等手法, 作了和儒家君臣, 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一套纲常名教相适应的调整.⁴⁴⁾ 三国时康僧会还通过编译『六度集经』, 把印度大乘佛教的慈悲观念和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加以沟通, 宣扬“仁道”说, “为天牧民, 当以仁道”.⁴⁵⁾ 仁道的内容包括爱民尊老, 孝事双亲, 反

44) 中村元 1982, 26-34. (再引用 方立天, 2006, 386).

45) [吴]康僧会『六度集经』卷8 (T. 03, 47a12-13).

对虐杀, 反对贪残, 以配合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 达到治世安民的目的. 东晋慧远更是明确地提出“儒佛合明”论, 说: “常以为道法之与名教, 如来之与尧, 孔, 发致虽殊, 潜相影响; 出处诚异, 终期则同.” “内外之道, 可合而明.” 佛教和儒家名教在民心教化和社会治理两个方面可以相互配合而彰明.⁴⁶⁾

汉译佛典一开始就不得不向儒家伦理观念作妥协, 调和, 同印度佛经的伦理思想相背离, 形成为和儒家伦理相协调的中国佛经伦理观念. 不过, 这也可以视为佛教对“入世”部分所作的调整.

2) 车子借儒证佛

佛教与儒家虽然理念不同, 有很多具体问题上有所冲突, 但它们都劝人为善. 以此为基点, 车子也常借儒家的观点来为佛教辩护. 当车子被问道如何正确认识佛的真正内涵时, 他将佛陀比喻为中国的三皇五帝. 并且当问难者质疑佛陀相貌过于超凡脱俗时, 车子举尧, 舜, 禹等儒家圣贤人物相貌的奇特之处来为佛陀辩护,⁴⁷⁾ 认为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正是圣人之相. 面对佛教削发毁形, 有违孝道的指责, 车子借孔子“可与适道, 未可与权”之言, 举孔子赞泰伯断发纹身为“至德”, 强调孝道固然重要, 但需要灵活运用, 懂得权宜之计. 可见车子深谙儒家道理, 对当时流行的儒家说法并不赞同, 认为过于它僵化, 教条化, 有悖儒家初心, 不得精髓. 关于这一点, 后面会有进一步论证.

作为汉末知识分子的一员, 车子弃儒从佛教与道家也是由于对当时儒学的形势不满的缘故. 不过, 虽然儒家的主流地位虽然有所动摇, 但已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十章问者就提到, “若佛经深妙靡丽, 子胡不谈之于朝廷, 论之于君父, 修之于闺门, 接之于朋友? 何复学经传, 读诸子乎?”⁴⁸⁾ 可见, 在中国儒学上入朝廷, 作为治国良策, 君臣父子的伦理典范, 下入百姓, 作为夫妇家庭中修养的标准和作为交朋友的行为指导. 另外, 问者还提到“入东观, 游太学, 视俊士之所规, 听儒林之所论”时, 从未听到过人们以“修佛道为贵”. 这从侧面反映了, 在当时儒学依旧是学术界的热门, 佛教依旧地处偏僻的社会现实.

46) 参照 方立天 2006, 386.

47)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2c9-15).

48)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4c14-16).

2. 佛儒之争

根本理念上的差异, 导致佛教与儒家两家在教义与制度大相径庭. 佛教的传入对儒家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最后演变为佛儒之间一次次的激烈论战.⁴⁹⁾ 而这些论战在『车子』中已初现锋芒.

1) 佛儒的矛盾性

佛儒之间最突出的矛盾, 在教义上有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与儒家的现世主义观念, 佛教的布施与儒家的节俭观和仁孝观之间的矛盾. 佛教的轮回说是关于人生的基本理论, 认为世界万法有六道, 即天道, 人道, 修罗道; 地狱道, 饿鬼道, 畜生道. 人根据此生所作所为-“业”决定来世转生于六道中的哪一种, 宣扬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佛教传入中国以前, 人们认为生死不能相互转换, 俗语有“人死如灯灭”, 死者不可复生. 佛教的轮回说是对人们固有观念的强烈挑战. 『车子』中问者就对“人死当复更生”提出质疑. 其次是关于布施. 布施是大乘佛教修行的关键, 在六度中居首位, 把布施作为修行解脱的重要手段. 佛教的布施观念这与儒家的“节俭”观相悖, 『车子』中的问者就对此发出问难, 直言太子须大拿(佛陀前世)“以父之财, 施与远人; 国之宝象, 以赐怨家; 妻子自与他人”的布施是“悖德”, “悖礼”, 不孝不仁的行为.

佛儒的矛盾还表现在制度上, 具体表现为僧人剃发无后与儒家的仁孝观, 貌服和礼仪方面的冲突. 佛教要求僧人剃发受戒, 披赤布, 托钵乞食等, 遵守清规戒律. 但儒家却主张“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儒家认为“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而佛教却主张“不娶妻生子”; 儒家有“貌服之制”, “威仪盘旋之容”, 但佛教却“披赤布”, “无跪拜礼”. 可见, 佛教在某些方面, 对儒家思想是巨大的冲击, 也挑战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2) 车子反儒论

面对问者上述言辞激烈, 泰山压顶式的问难, 车子也不甘示弱, 他以其丰富的知识背景, 引经据典, 一一给予解答. 对于佛教轮回说, 车子举“死后叫魂魄”的习俗, 举『老子』言“吾所以有大患, 以吾有身也. 若吾无身, 吾何患之有?”“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等, 『孝

49) 佛教与中国文化冲突, 在南北朝时期最为激烈, 有些重大冲突甚至延续到隋唐时代. 冲突的领域在哲学上有生死, 形神之争, 有无因果报应之争等; 在伦理道德上有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 礼制, 夷夏的斗争以及君权和神权的问题等. (参照 方立天 2006, 388).

经』中有祭祀鬼神的内容，周旦为武王请命事鬼神等例子，⁵⁰⁾ 证明佛教的生死轮回等观念与中国传统并不相悖。他还举“太王立季为嫡而成周业”，“舜不告而娶”，“伊尹负鼎干汤”，“宁戚叩角要齐”⁵¹⁾ 等虽有悖儒家教义，却被传为佳话的事例，论证佛教的布施是大道。车子强调布施的精神和功德。⁵²⁾ 虽有答非所问之嫌，但也基本符合佛教对布施的要求。

对佛教剃发无后与儒家的仁孝观，貌服和礼仪方面的冲突，车子采取举孔子的“可与适道，未可与权”，强调需要通权达变。“泰伯断发文身”，孔子却称此为“至德”，赞美“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为“让之至也”。此外车子还举出“豫让吞炭漆身”，“聂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以及“高行截容”这些为坚持内心的追求，而毁容残体，却被传为佳话的事迹来论证沙门出家修行是为大义，是合乎儒家的“至德要道”。⁵³⁾ 在车子看来，评判忠孝需要遵循的精神实质，不能只流于形式。他引『老子』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称妻子，财货，名誉和子嗣皆为身外之物，清躬无为才是至妙之道才上等人追求的东西。沙门为修道而抛家弃子，放弃世俗享乐，是高尚的行为；他还引『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主张，不追求形式之德才是“上德”，举“三皇之时，食肉衣皮，巢居穴处，以崇质朴”说“沙门之行，有似之矣”，以此来论证沙门披赤布，无貌服制度和跪拜之礼是追求老子所说的“上德”，符合圣人崇尚质朴的观念的。⁵⁴⁾

与儒家的论战中，除了被动防御，车子还主动发起挑战。他借引『老子』“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⁵⁵⁾ 暗讽儒家为世俗下士所为。在关于佛经的问难中，问难者认为佛经的经文繁多，华而不实，不如儒家的七经简洁明了；又说佛经多用譬喻，“非道之要”。车子以“小不能容大”为由，认为佛经讲世界万物的形成和毁坏，讲佛陀无数生前修道故事和各种出世教义等等。他举孔子复作『春秋』和『孝经』来补五经的例子，暗指儒家经典并非完备无缺。⁵⁶⁾

可见，车子既对当时儒家学说持批判态度，认为当时儒学的问题是，只重形式而忽略了其精神实质。他举道家或者原始儒家的事例，反对当时的儒学，同时也从侧面论证佛教的合理性。可见，佛教对儒家不再一味地迎合，这或许与汉末儒家统治地位的动摇有关。

50)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3b24-c9).

51)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52, 4a4-13).

52)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52, 4b2-13).

53)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2c16-3a6).

54)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3a23-b3).

55)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4c21-23).

56) 『弘明集』卷1「车子理惑论」(T. 52, 2a29-b25).

V. 结语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息息相关。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法和以支谶为代表的大乘般若学能当时传播开，主要因为佛教与黄老方术，更具体来讲，是黄老方术中的神仙方术和道家思想的近似性。但起初相对于道家思想，当时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其视作神仙方术的一种。这是因为早期佛经翻译大多借用道家思想或词语，而能接触到佛经，并理解其思想内涵的毕竟只在少数。另外，人们对于一种完全陌生的事物，总是先观其貌，再玩其味。

『车子』对三教的论述，基本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汉末三国，社会动荡，导致意识形态发生转变，儒家在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道家法家等思想复兴，佛教开始发生转型—弃“方术”而从“道家”，从初传汉地时依附黄老方术，或神仙方术转而更明确地强调与道家学说的相通性。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车子以期丰富的知识背景，引经据典，以道释佛，驳斥神仙方术，用儒，道反儒论，成功地划清与神仙方术关系的同时，与正在复兴的道家思想建立了明确地联系，这对佛教以后的发展意义重大—使佛玄合流，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盛况的出现，以及僧肇的“不真空论”的建立成为可能。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佛教的迎拒表现出巨大的独立性，主动性，从而强烈地影响了佛教的面貌，左右了佛教的发展。中国文化潮流是相继演变的，不同时代的主流思想给予当时佛教的影响最大。同时，由于佛教的不同领域，不同派别具有很不相同的内容，因此又分别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别，并与之合流。⁵⁷⁾ 史书对于『车子』卷数记载不一，有的说是一卷，也有的记为两卷。对比一些著作对『车子』的引用就发现，每个时代的『车子』内容都会稍有变动，总体来说是一个由简到繁的过程。现今读到的『车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出自多人之手加工整理而成的。⁵⁸⁾ 因此，『车子』中的佛教是时代的画笔所描绘的一幅复合性的佛教形象。

57) 方立天 2006, 384.

58) 学界研究认为，『车子』时空上应跨越了从汉末到梁代约三百多年的岁月。

一、古籍

『弘明集』 T52.

『高僧傳』 T50.

『六度集經』 T03.

[西汉]司马迁, 『史记』 『二十五史』 1. 198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西晋]陈寿, 『三国志』 『二十五史』 2. 198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宋]范晔, 『后汉书』 『二十五史』 2. 1987.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研究专著

刘立夫, 魏建中, 胡勇 译注. 2013. 『牟子理惑论』 『弘明集』上. 北京: 中华书局.

汤用彤. 2015.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任继愈. 2019. 『中国佛教史』 第一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方立天. 2006. 『中国佛教文化』 方立天文集第三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吕澂. 2017.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北京: 中华书局.

余嘉锡. 1936. 『牟子理惑论检讨』. 燕京学报第二十期单行本, 北京: 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魏道儒, 李利安. 2015. 『世界佛教通史』 第三卷, 中国汉传佛教.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三、学术论文

张风雷. 2022. 『“格义”之广狭二义及其在佛教中国化中的历史作用』 『哲学的性空—前言问题与研究方法』: 203-205.

中村元. 1982. 『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 『世界宗教研究』第二期: 26-34.

李笑岩. 2009. 『先秦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 博士论文, 山东大学.

马梦彤. 2017. 『汉中期以降黄老思想的分化与转变』 硕士论文. 郑州大学.

张凯. 2014. 『“牟子理惑论”读后』 法音论谈. 第七期.

张绥, 常霞青. 『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辨伪』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93-94.

韩铮. 『从“牟子理惑论”看佛教中国化』 中国宗教: 60-61.

http://read.goodweb.net.cn/news/news_view.asp?newsid=95839 (检索日期: 2023.02.28.)

The Early Accep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China - focus on Mouzi's *Lihuo lun*

QIU LISHA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 China around the Han Dynasty. In the early days, it was mainly known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public through the theory of Huang-Lao and the Fairy and Divination, which both wer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ies. However, at the end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social ideology was affected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by the political turmoil, and emerged a new landscape. The moral concepts created based on Confucianism, which was originally the mainstream of ideology, began to waver, and other ideologies that existed in the past such as Taoism and Legalism revived. For the same reason, Buddhism also entered its own new turning point by emphasizing the similarity with Taoism rather than Huang-Lao and the Fairy and Divination. The image of Buddhism depicted in Mouzi was Buddhism at this time.

In the text of Mouzi, a Chinese man named "Mouzi" was proficient in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the theory of Fairy and Divination. From his young age, as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turmoil period, he began to believe and study Buddhism. He interpreted Buddhism with the concept of Taoism, and disprove Confucianism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Four Books

and The Five Classics, the very own books of Confucianism's. Last but not least, he took the initiative by criticizing the Fairy and Divination to advocated Buddhism. All above served as the foundation for Buddhism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Chinese ideology. The image of Buddhism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depicted in Mouzi was a complex face of Buddhism representing that era.

Keyword: Mouzi's *Lihuo lun*, Buddhism, Taoism, Confucianism, The Fairy and Divination

2023년	3월 7일	투고
2023년	3월 27일	심사완료
2023년	3월 31일	게재확정